

徐令义著

温州试验区 发展态势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553

序 言

温州，这个以家庭工业为基础，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被称之为“温州模式”的地区，曾经名噪一时，举世瞩目，调查考察者纷至沓来，研究温州经济的著作如雨后春笋。1987年，温州明令规定为“试验区”以来，继续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但迄今尚少系统研究的著作问世。徐令义同志所著《温州试验区发展态势》一书的出版，有助于填补这一空白，至少，作为问路之石，亦可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兴趣。

温州人写温州的书，自然带有丰富的感情和浓郁的地方色彩，《温州试验区发展态势》一书的确写得颇有特色。书中以温州发展商品经济为中心，上溯历史渊源，重在现状和发展的考察。书中所列温州试验区十大发展态势，对温州的经济和文化、城镇和农村、工业和农业、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等作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考察，使人能对温州的改革开放有一个系统的全面的认识，而且思路清新，文字流畅，读来颇能引人入胜。尤其是作者勇于探索，对一些有争议问题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对经济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也能提出有益的建议，虽其中或有不尽完善之处，但也能予人以启迪。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不仅对温州的商品经济发展作了历史的辩证的分析，而且最后还专门写了一篇“温州试验区的哲学思辨”，对改革试验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进行思考。这在本书内容和结构上也是一大特色，使人耳目一新。

徐令义同志多年从事理论宣传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材料，经过反复思考，综合分析，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这种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风，也是值得深深赞许和学习的。

今年五月，我们去温州调查，得识徐令义同志。接谈之余，深感他情况熟悉，见解精辟。如今作为他的著作的首批读者之一，得益不少。愿为之序

曹麟章 1988年10月于上海

前 言

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温州有东西可写，这是前提。

开始，我也并没有写书的愿望。只是工作的缘故，经常接触温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也经常接触来自中央和其它省市部门到温州考察研究的同志，陪同他们参观，回答他们的提问，当然也有许多问题回答不上。这样便促使我去调查和搜集材料，完成上下左右的必要应酬。材料占有多了，思考的问题也越多，慢慢地便有了写书的想法。

从时间上说，大约对1986年上半年以前温州改革的情况都有书写过了，而且一共写了十几本，此后不知怎么地还没有这方面的书。这顿时使我觉得“时来运转”。1986年下半年到1988年上半年整整两年，时间不算短，更何况这段时间是温州试验的发展时期，许多做法有初创性，这就决定着写本这书的内容价值。

因为是书，它有系统性、可读性的要求。所以，写现在的东西，不免要把历史的、过去发生过的东西当作陪衬。于是，书就沿着由古到今、薄古厚今的思路定了下来，构成“温州改革试验的社会基础探源——温州试验区十大发展态势——温州改革试验的哲学思辨”这样一个三部曲。谓之“态势”，它既朦胧又清晰，意在表达温州试验区的发展姿容、情状、趋势。

写书这还是第一次。好在出版社的同志乐意接纳，这从情理上给了我莫大的宽慰。

——作者1988年7月于温州

目 录

序言：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曹麟章

	前言	(1)
第一篇	概论	(1)
第二篇	温州改革试验的社会基础探源	(9)
	一、小商品城市的永嘉郡	(9)
	二、温州开放史话	(14)
	三、温州模式与永嘉学派	(18)
	四、解放后温州的风风雨雨	(21)
第三篇	温州试验区十大发展态势	(25)
	态势一：私营企业群体化	(26)
	一、私营企业的定义及概况	(26)
	二、私营企业的成因	(28)
	三、私营企业发展的理论导向	(30)
	态势二：企业股份化	(34)
	一、家庭工业向企业股份化发展 的导源	(36)
	二、股份制企业的效率	(40)
	三、股份制企业的困惑	(43)
	四、股份制企业的启示	(46)
	态势三：股份企业混合化、混合集团化	(48)

一、股份企业混合化的由来·····	(48)
二、股份混合集团企业的 典型解剖·····	(50)
三、股份混合企业的理论探讨·····	(53)
态势四：商品经济发展整体化·····	(55)
一、三种有效的扩散形式·····	(56)
二、商品经济整体化的制约因素·····	(60)
三、商品经济整体化的理论启示·····	(61)
态势五：金融改革递进化·····	(63)
一、农村金融改革的双向发展·····	(64)
二、城市股份信用社的异军突起·····	(67)
三、典当业的融资手段·····	(69)
四、城乡金融改革一体化·····	(71)
五、资金市场的新拓展·····	(73)
六、金融改革试验与宏观调控·····	(74)
七、金融改革试验的“三点”论析·····	(76)
态势六：集镇建设规模化·····	(78)
一、集镇兴起的动因分析·····	(78)
二、集镇驱动二元结构的转换·····	(80)
三、集镇建设的主要途经·····	(82)
四、集镇建设的社会学意义·····	(86)
态势七：农业规模经营适度化·····	(92)
一、有效启动·····	(93)
二、四大类型·····	(95)
三、发展态势·····	(100)
四、导向研究·····	(102)

	态势八：市场体系化·····	(105)
	一、温州市场的演变·····	(106)
	二、生产资料市场掠影·····	(114)
	三、民间人才市场鸟瞰·····	(116)
	四、信息、技术市场随览·····	(119)
	态势九：改革试验规范化·····	(121)
	一、自由经济的由来·····	(122)
	二、商品经济的出现·····	(123)
	三、改革规范的具体分析·····	(125)
	态势十：精神文明层次化·····	(127)
	一、精神文明三层次的转换·····	(127)
	二、对温州人“人的价值观念” 的研究·····	(130)
	三、鼎足文化雏形的新格局·····	(133)
	四、精神文明建设的三种试验·····	(136)
	五、精神文明建设的两种新途经·····	(140)
第四篇	温州改革试验的哲学思辨 ·····	(146)
	一、消极现象剖析的代价观·····	(147)
	(一)从两种评价方法说起·····	(148)
	(二)代价与“共存观”·····	(150)
	(三)发展是减少代价的途经·····	(151)
	二、社会公平与否的效率观·····	(153)
	(一)城乡关系公平与效率·····	(153)
	(二)私营工业和国营工业公平关系 考察·····	(157)
	(三)分配不公的效率机制·····	(161)

三、改革试验的实践观.....	(164)
(一)实践对于政策的具体意义...	(165)
(二)实践对于法律的具体意义...	(166)
(三)实践对于理论的具体意义...	(168)

第一篇

概 论

一、温州是个气候宜人，山水如画，人物风流的地方。千百年来，多少中外游人为之倾倒，多少文人墨客讴歌赞美。清朝孙扩图在其《忆江南·温州好》词中赞道：“温州好，别是一乾坤！宜雨宜晴天较远，不寒不燥气温恒，山色异朝昏。”在这里，古老和文明，神奇和真实，都使人们回味无穷。翻开历史的画卷，这里人才辈出。看，盛唐时的书画家、诗人张湮、明易象、擅草隶、工山水、娴音律，与王维、孟浩然等相友善。明代开国勋刘场（伯温），以他杰出的智慧和才能，辅佐朱元璋翦除群雄，统一天下。清代学者孙冶让，是晚清著名的经济学家、文字训古学家，他的《墨子闲话诂》、《周礼正义》，世称绝学。这里摄下的仅仅是历史的一隅。近代的温州，更有“数学家之美称。姜立夫、苏步青、李锐夫三位数学界前辈，誉满国内外。复旦大学、西安交大、厦门大学、杭州大学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谷超豪、徐桂芳、方德植、白正国、杨正道，都是温州籍的数学家。温州这块肥沃的土地，不仅哺育了代代学者名流，而且也哺育着勇敢顽强，吃苦耐劳的人们。1930年，红十三军在温州树起了武装革命的旗帜，创建了浙江最早的一支工农革命武装，1935年，栗裕、刘英同志率领浙闽挺进师在浙南开辟革命根据地。温州许多优秀儿女为了

开创一个世界，抛头颅、洒热血，历尽艰难困苦，坚持斗争到最后胜利。温州是个著名的风景旅游胜地，模山范水，钟灵毓秀，雁荡云影，瓯海潮踪。温州素以奇山秀水扬名海内外。她那宏伟磅礴和旖旎秀丽的独特风光赢得了“东瓯山水甲东南”的美誉。名闻寰宇的先秀山、北雁荡山，以她层峦叠嶂，奇峰林立，瀑飞泉涌，洞壑幽深的特色被人们誉为“寰中绝胜。”三十年代德国地质学家毕士顿游雁荡山后撰文：“雁荡风景媲美瑞士，世界山岭之奇、风景之佳，莫过于此”。江心孤屿；聚碧凝翠的浓荫中微露垂檐青瓦，飞彩流丹；东西双塔，耸峙相望，长堤上浓荫蔽月，繁花似锦，好一幅“江心胜景似蓬莱，却从海上结楼台”的美丽景色。岁月的流逝，历史的发展，蕴藏在温州人民心中的美好心愿逐步化作了现实。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春风，吹出了一个生机盎然、青春焕发的新温州，以她独树一帜的“温州经济新格局”踏上我国城乡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征程。现在人们又在编织更新、更美、更真的理想蓝图。至1987年，全市人口644万（其中非农业人口93万人，农业人口551万人，温州市下辖一市二区八个县（瑞安市、鹿城区、龙湾区、永嘉县、乐清县、洞头县、瓯海县、平阳县、文成县、苍南县、泰顺县）。

二、1949年，温州工农业总产值为6824万元，港口吞吐量为16万吨，城市人口为15万人（其中工商业者1.1万人）。在政治上，解放以来温州经历了许多波折。1956年正当农村合作社运动高涨之时，温州的永嘉县却大兴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之风。当年永嘉县分田单干的地方春花作物增产了40%，达到解放以来的最高收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期间，

工业总产值每年只递增0.1%，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农民从事单一的农业经营，230万劳力限于人均四分地的范围内，社会动荡不安，武斗越演越烈，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

三、解放以来，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考察，温州经过了几次发展与挫折的反复：①国民经济的三年恢复时期，经过农村土改和城市的民主改革，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城乡工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56年温州个体手工业的从业人数从1949年的1.1万人增加到2.55万人，产值从900万元增加到3219万元。然而1958年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取消家庭工业，关闭集市贸易市场，温州工商业就此衰弱。②1962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贯彻，农民经营工商业，集市贸易、农村工业，城市街道工业得到苏复，许多产品创造建国以来最好水平。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把商品经济视为“复辟资本主义温床”，温州商品经济再次遭受谴责。③“文革”后期，温州的家庭工商业和个体商贩在各级政府陷入瘫痪、半瘫痪和无暇顾及的情况下，在“地下”重新得到发展。1977年与1971年比较，农村工业产值提高81%，市区街办工业产值增长一倍多。至1978年上半年，“左”的思想还未得到彻底清理，把温州利用空隙冒出来的商品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典型”，把长途贩运视为投机倒把，使温州城乡经济重新走上徘徊的老路。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指引下，温州干部、群众从“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破除思想迷信、理论迷信，唯实思维，大胆改革，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得以蓬勃发展，温州的社会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形

成了温州经济新格局。

四、十年来温州的改革过程及其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始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3年底为止。温州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几乎是一步到位的，即“生产队直接分解为承包到户”，这在客观上为改革赢得了时间上的优势和主动。其结果，一方面农村剩余的170万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开始转向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就业结构由原来的7:3变成倒三七（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例），农村产业结构大规模调整，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农村改革给城市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城市出现由能人带头，自愿组合，自备资金，自负盈亏的“戴红帽子”的街道工业。第二阶段是形成时期，家庭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大，在沿海各县（市、区）从1984年起全面超过公有经济，并出现了一批私人工商业雇工大户，即私营经济。继后，以雇佣劳动关系为特征的私营经济继续蓬勃发展，从1986年起超过其他所有制形式，跃居温州农村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形成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以私营经济为主体，以农民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温州农村独特的所有制结构。第三阶段为发展时期。1987年5月浙江省委书记办公会议“关于温州试验区工作纪要”下发以来，温州进入较深层次的改革试验，出现了企业股份化、股份混合化、混合集团化的（与原来意义上的“温州模式”有质的区别）发展趋势（在第三大部分中具体展开论述），给温州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试验注入了新的内容和带来了新的转机。

五、温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由原来初始阶段到形成阶段，由形成阶段到发展阶段，构成了温州独特的所有制结构。据1987年统计口径（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全市工业总产值达60.34亿元，其中国营（8.6575亿元）占14.3%；集体（含相当部分“戴红帽子”的乡镇私人企业产值32.7837亿元）占54.3%；个体、私营经济占31.4%。社会商品零售额中（32.66亿元）；国营商业（8.0628亿元）占25%；供销合作社（3.92亿元）占12.3%；城市集体合作商店（7.147亿元）占22%；个体商业（9.43亿元）占29%；农民对非农居民另售额（4.0771亿元）占12.15%。这种所有制结构显示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良好性能。第一，它使个体家庭经济发展生产，扩大规模，追加生产要素的种种疑虑烟消云散，激发起大胆致富的强烈愿望，作百万农民的劳动能量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空前高涨。第二，它使农民家庭之间的生产要素在动态中重新组合，一些家庭扩大了生产资料需要增加新的劳动力；而另一些家庭则当边际劳动生产率等于零时，剩余劳动力为了摆脱贫困寻找就业门路；这样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重新组合就形成了新的社会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并不是被剥夺了原来的生产资料，而是自愿放弃不充分的生产资料而实现新的组合。生产要素是有限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是无限的。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无疑能构成强大的生产力。第三，社会精神文明状况不是更糟了，而是更好了。农民在商品经济的洗涤中观念形态起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观念的先导作用使商品经济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或半山区和山区梯度渗透，具有商品经济的总体效益。精神

文明的硬件建设，则主要取之于民间丰厚的财力，通过集资、捐资、合资兴办了大批文化设施、教育设施，客观上解决了国家财力对精神文明硬件建设投资过少的矛盾。据不完全统计，全市用于这方面建设的民间财力达1亿元左右。精神文明建设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方向保证。值得提出的，温州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方式并不是金钱雕塑起来的静态形象，而是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的动态组合。

六、温州经济格局生产力发展的良好性能，还可以从三中全会前后十年“量”的比较中得以证实。详见下表主要数据（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

	1978年	1987年	1987年比 1978年增长
社会总产值		107亿元	
工农业总产值	13.0亿元	78.67亿元	4.1倍
国家财政收入	8442万元	6.09亿元	7.2倍
农村人均收入	55元	626元	11.4倍
城镇居民收入	423元	1043元	2.5倍
农村集镇发展	23（个）	101（个）	4.4倍

七、值得提出的是，就全国而言，生产力发展的外部因素的多元性，决定着生产力发展在投入与产出的效益上很难得出一个准确的可比值。这些因素包括：一是自然资源优劣情况，这是潜在生产力；二是交通情况，交通在某种意义上

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命脉；三是投资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工业化程度的优劣，现代化水平的高低；四是人文资源，即教育水平和潜力在社会生产中的主要作用。着眼于这些生产力发展参数的分析，温州自然资源是贫乏的。陆路交通严重落后，水路运输目前只有5000吨级的泊位，交通落后客观上内耗了工业企业的效益，关于投资那更是少得可怜。1950年到1978年，温州企事业的投资总额为5.5862亿元，占同期全省投资总额（113.2亿元）的4.86%，而温州的人口却占全省人口的近16%。因此，温州只能选择“自费改革”的路子，生产力的发展也只能凭借人文优势。温州的地方财政是“吃饭财政”，因而“自费改革”的条件不象广东、福建省等地以强有力的地方财政为后盾，而是只能借助于民间的财力。比如，温州农村十年来新发展了80多个集镇，共投入资金16亿多元，其中取之于民的占80%强。

八、从社会经济环境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上分析，温州的改革试验有两个重要的选择：一是选择了集镇建设。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决定着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农民开始投入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环境，是自然经济基础上互相封闭、信息不灵、交通不便、文化落后的原始村庄。这样的社会环境不利于社会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层次的提高。那么农民出路何在呢？发展中国家有的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当年“圈地运动”式的转移方法，然而城市脆弱的工业基础远不能容纳这千军万马的劳动大军，而且这种劳动力转移方式也不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在这一点上，“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集镇这个阔宽的前景，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具有客观规律性的。集镇规模建设，

不仅改善了生产力继续发展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而且酿造着某种新的生产力的飞跃。在温州，集镇人口占农村人口的近40%，产值占农村产值的50%，在沿海县（市、区）集镇的密度约十来公里和几十公里一个。二是选择了市场建设。产销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务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资金市场、房地产市场、产权转让市场）等500多个。市场的全方位开放和体系化，为生产力的诸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实现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创造了条件。

第二篇

温州改革试验的社会基础探源

分析、考察和研究温州现实的社会经济和改革发展问题，有必要从温州地理环境的、历史的、文化的、城市特征的等方面提供一个大的背景材料。这样做，不仅能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通过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认识其规律性的东西，而且对于今天完善温州模式和在此基础加快试验，都不无重要的借鉴意义。换言之，不认识温州的过去就很难认识温州的现实，要想研究今天的温州，必须着手研究昨天的温州。温州的实践表明，改革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既基于现实又基于历史。

一、小商品城市的永嘉郡

温州，古称“瓯”，早在4000年前就有原始瓯人居住活动。东晋太宁元年始建永嘉郡，唐高宗上元二年改称温州。历史上的永嘉县郡是浙南、闽北的经济中心，是“控带山海，利兼水陆”，实东南之沃壤，一都之巨会”的历史名城，尤以商品经济发达而闻名。

这里仅以宋代为例，当时的永嘉县（大致包括现在的温州市区、永嘉县、瓯海县等）商业繁盛、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熙宁十年的商税额为二万五千四百九十一贯，而当时全国各县的全年商税额平均为三千五百八十一贯（《宋会